



神聖啟示與良知的寫作

北村

編者按

北村，中國著名基督徒作家，現為北京方舟教會義工。本名康洪，1965年9月生於福建。1985年於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即從事文學創作，被譽為中國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1992年3月受洗成為基督徒後，創作轉向關注人的靈魂、人性和終極價值的探索，以「神聖寫作」成為國內小說界的獨特現象。迄今出版作品多種，其中《周漁的喊叫》改編為電影「周漁的火車」。近著包括：《憤怒》(2004)、《公路上的靈魂》(2005)、《我和上帝有個約》(2006)。

由於篇幅限制筆者不可能在本文中完整闡述我對那個最核心問題的見解，何況這並不是出於我個人的意願，所以本文沒有論證的義務，毋寧說它更接近於一種宣告。正如《獨立宣言》開始所言：「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證自明的……」如果真有一種不證自明的存在，那我們會輕鬆多了，並且我們會承認為真理，結果一切便是真理的彰顯了。身為一個作家，他的寫作作為他的言說方式總是先和真理達成和解，然後才找到他的言說物件——因為分離是可怕的。作家能夠繼續寫作並不是由於他的智慧，乃在乎他的能力和信心。但現在的情形是，在一個貧乏的時代，詩人何為？不是先有了一個貧乏的時代，詩人才到處奔走，乃是詩人先失去了信心，無法歌唱，這個時

《神聖的啟示與良知的寫作》原刊於《鐘山》文學雙月刊第96期(1995)，全文表達出北村如何理解其文學寫作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可視為其「神聖寫作」的宣言與告白。本中心獲北村同意，特全文轉載，讓各位認識及了解這位在國內不以福音成恥的基督徒作家。



代才變得貧乏。

對一個時代僅僅認識其貧乏是遠遠不夠的，問題在於到底是什麼貧乏？我們可以越過當下文學的種種特徵(頹廢、形式主義迷戀和自瀆)深入到它的內部，看見更致命的情形，那就是信心與能力的喪失導致意志消沉，這種生命力的枯竭和萎縮是人文精神內在的危機。而這種危機是人類性的，中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初的文化討論中遲遲無法解決的問題今天成了一個絕症——而且開放的經濟使中國突然躍進消費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

失落，幾乎徹底喪失了話語權力，幾重的危機和困惑使一向「天下為師」、企圖以「道統」駕馭「政統」的知識分子的理想逐漸幻滅，我們可稱之為精英意識和現實理想的幻滅，從這個中間價值起點來討論人文精神是註定沒有結果的，正如當年劉再複式的人道主義的「懺悔」只是指向道德而不指向終極一樣。僅從認識的意義上企圖使知識分子重新起來充當價值載體維繫破碎的人心，永遠只是理想。同理，知識分子試圖找回代言人地位和敘述者身份也是徒勞的，因為言說需要的不是認識能力和智慧，也不是一套道德準則。言說需要的是信心和能力，而知識分子恰是在這一點上顯示了自己的貧乏。

知識分子這一稱謂的可疑在於，它似乎只與知識有關，而知識是可以通過認識能力達到的，設若人可以以自身的認識能力為終極和信心的基礎，為什麼知識分子在末世會喪失信心呢？人類知識的積累來自於天然的求知欲，這是智慧的要求，而求知欲的動力乃是懷疑，而懷疑和批判正是哲學的起點和內在力量，但現在的情形是懷疑本身成了結果，批判失去了尺度，最後導致了批判的基本立場的放棄，這種放棄代表了人文精神的崩潰，表面上是文化問題，實際上是背後的精神價值問題。中國在近十多年來大量接受西方知識的結果是更快地遭遇了與西方思想界同樣的困境：那就是知識和認識能力的困境。

中國知識分子究竟有沒有屬於自己更隱秘的困難？到今天為止，幾乎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還不敢追問一種普遍的人文精神的根源，而只想建立「我」作為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居所，「五四」留給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正義感遭到嘲弄和詆毀以後，他們似乎變得更加小心翼翼和懦弱了，因為使命感和正義感只是對真理的猜想，他存在於人的思想和感覺裏，而不在人的信心裏，所以它缺乏與現實對抗的能力，它不過留給中國知識分子一套行為準則和道德理想，它仍然是知識的。真正的人文精神是道德價值的出發點，不是道德價值本身，正如摩西十誡不是神本身一樣。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從來沒有「神」的觀念，他

們的「絕對」和「天道」是以人對受造物（自然）的認識關係達成的，它的本質是智慧。因此，生命的體驗淪落為對自然的體驗，人就成了體驗的出發點，於是，終極關懷自然下降為道德關懷。所以，中國文化中一直存在道德關懷，甚至實踐為「道德救國論」，對民族存亡危機的思考代替人類關懷成為最高的精神事務，生命體驗成了道德感和民族情感的體驗。我相信中國知識分子是困惑的，但由於困惑帶來對精神的追問早在屈原那裏就中止在「去國」的絕望中，這是一種機制，它是最完美的消解策略，使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關懷進入扣人心弦的操作：或者進入廟堂，或者返回民間，都在一個道統裏循環，而且這種一來一回的遊戲跟土地關係的親密程度遠甚於與天空的關係。無論是「儒在廟堂」或者是「道在山林」，他們的人文關懷由於屬地的遮蔽，總缺少超驗的價值。不是為王所轄制，就是為自然隱沒，缺乏一個不動的根基。人文精神在這裏已經蛻變為文人精神。「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富於操作性，但倘若無法實施，它的根基就要瓦解。可見，人文精神的個別實踐是不能代替那個普遍原則的本身，它應該是永恆不變的。我們知道，文人精神只是一種理想，它不代表實際，更不代表真理。

這個巨大的消解機制是堅硬而完整的，以至於魯迅先生也最多只能為「拿來主義」的口號作出慎重的解釋，拿來並不等於接受。問題還在於，今天我們要接受什麼？「五四」的成果只拿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如果我們對西方思想的沒落有一個認識，我們會發現，當工具理性吞噬價值理性時，人類理性的神話已經破產。人文精神原是本於理性精神的，正如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這就是說人類肯定自己的認識能力是存在的根



基，但是，人類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正如時間之於無限、思想之於生命一樣，有限的人以理性為精神起點，並從中確立了自我超越的價值。然而，認識能力並不是建立在已積累的知識基礎上（因為認識的範圍是沒有窮盡的），而是建立在信心上。人認識世界的方法是命名，只有通過命名才能把人從物件中區別出來從而把握物件，進而使人獲得真實的主體地位。這種命名使人有信心，但命名需要的權柄，這權柄就是神。神把權柄交給人，人成了神的代表權柄，人代表神管理萬物，這就是人的本位。如果離開了一個有位格、無限的神，人沒有權柄，只有思想，人就通過自己的認識能力製造一個龐大的思想系統和遊戲規則。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無論這些思想系統和遊戲規則如何豐富，它卻缺乏中心，缺乏能力和信心，由於與無限的分離，現實在思想的鏡片後面依舊是割裂的，而且越來越破碎，人在這種現實面前只能喪失信心，恐懼和絕望，這就是人類理性的失敗，是人類用理性代替直覺的結果，而直覺才能接受真理。

人類的非理性走向了一個反面，這是一個人否認自己之後又拒絕神聖啟示的荒謬境遇。薩特認為在理性範圍內一切都是荒謬的，所以人的自由意志與理性無關，在這裏是非消失了；在海德格爾那裏，一切的答案與理性也是兩回事，但答案到底是什麼呢？如果既沒有神，人類的理性又靠不住，問題就極端嚴重起來。卡繆論到自殺，但他最後找到的是西西弗斯對推石上山體驗的把握，他並不敢揭露這只是一個預設，否則他會崩潰的，他需要挺住。而同樣的情形在海德格爾那裏，產生了一種叫焦慮(angst)的東西，他雖然認定焦慮是無邊的，是對存在而言的，就是人失去

命名和自我命名能力之後的情形，但他還是認為焦慮使人有存在的肯定，從而催逼人去作出抉擇。但他到底作了什麼抉擇？沒有。海德格爾的「思」只是對神的期待。

存在方法論並不能堅持最後的人道主義立場，因為人的實質已經被替換了。所以福柯只好宣佈「人類已經死亡」。20世紀中葉以來，人的中心性開始瓦解，這種「主體的非中心化」不僅存在於結構主義，也存在於後結構主義中。福柯認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類已經死亡的結論是否真實？我們毋寧說，因為傳統哲學對「人」的概念已經瓦解，是人在哲學上瓦解，而人並沒有瓦解，基督徒會支持這一看法。神作為中心並沒有瓦解，他是自有永有的一位，絕望的是人。福柯是沒有盼望的，所以他說：「我希望消失，我希望我的論述消失，希望我的書跟一個工具箱一樣：大家都可以隨使用他所需要、所感興趣的那一部分。」福柯把他的書看成一個工具箱，是自我交出話語權力的。在語言面前，由於離棄神，人只能降低自己的品格。人類理性和認識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意志，在這裏，福柯放棄了他的意志。

這就是人的困境。由於人的背逆，離棄神的結果是人依靠自我的能力製造一個系統，但系統是人的造物，不是神的造物，神的造物裏有生命，人的系統裏只有知識。在系統裏人與人無法正常交通，只有交換和控制的關係，於是，物質的要求取代了生命的要求，人的超越性價值讓位於市場價值，資訊頂替交通，最後語言反過來轄制自己，人類在語言面前先是失信，後是失語。

德里達要對付的「邏各斯中心論」也可以說是「言語中心論」「邏各斯」(logos)的希臘文中既指理性又指說話。現在的問題在於，有兩個不同的源頭，從雅典來的希臘哲學使希臘人相信一切知識或事物中都有個邏各斯；但這個邏各斯與那個源於耶路撒冷的啟示裏作為神的對話的邏各斯是不同的。希臘哲學裏的邏各斯指的是理性意義上的本質，它還可以被稱為實體、第一因、實在甚至結構，從這一源頭而來的無數哲學家，曾因不同的概念和範圍代表它，比如柏拉圖的「理念」，笛



卡爾的「我思」，斯賓諾莎的「實體」，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胡塞爾的「先驗自我」、分析哲學的「語言」到列維裏斯特勞斯的「結構」，都是這個邏各斯的變種。所以，這個邏各斯就是理性，它是人類認識能力的中心，以「自我」為出發點；而《聖經》作為神話語的邏各斯指的不是理性，而是生命，它是人類相信的物件，以啟示為出發點。

進行這種區分是很重要的，它會使我們看到德里達即將開始的進攻，實際上只能是對希臘哲學裏那一個「邏各斯中心論」而言，他無法建構生命。他認為世間並不存在絕對的真理和普遍的規律，這是針對人認識能力的局限而言的，而德里達建構邏各斯「在場」或中心地位，實質上正是對傳統哲學的解構，它宣告了人類神話的破產，人的話語權力從「言語」讓位於「書寫」，語言失去了中心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人的中心地位的解體，德里達指出言語和書寫二元對立的事實之後，人實際上已經自動放棄了話語權力，人也就放棄了立場。

現在我們轉向另一個重要人物：哈貝馬斯。雖然普遍主義神話已經動搖，但人們並沒有放棄它的打算，因為他們無法承受正義與邪惡不能區分的後果。但中心已經淪陷，如果不問內容，是否可以重建一套拯救普遍主義的策略？哈貝馬斯認為：可以規定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論證原則，凡是滿足這些規則的規範和命題就是有效的；而且人只要按這套規則對話就可以達成一致。這裏有兩個問題，哈貝馬斯的原則是一種論證原則，乃在理性的範圍裏；第二，誰來規定這套原則呢？答案是令人難以啟齒的。對於德里達宣讀的死刑判決，哈貝馬斯的上訴不但顯得空洞，而且無力。

人失語了。人既然失語卻仍舊說話，我們只能將這種說話稱之為聒噪。由於人類的認識能力錯誤地建築在一個預設而非生命之上，人類最終只能走向失語。人文精神的重建不是可以討論出來的，新的理解之下重新整合只是一種理想。失語的原因不在於人類的認識能力的衰竭，乃在於失信。實際上今天人類的認識能力超過以往任何

一個時代，但人類的精神卻萎縮到一個地步，喪失了全部的價值立場。人一旦失去信心就失去了超越現實的能力，人只能情緒頹廢意志消沉，以至於降低精神品格，生活得如蟲一般，這是精神虛無的基本特徵。於是一些景象出現了：實有空間膨脹，心靈空間萎縮，感動下降為感覺，神聖與卑微同等，從敬虔走向背德，熱情變作冷漠，愛成了性。

在這個離開神之後不斷墜向深淵的旅途中，哲學不但沒有幫過人的忙，它最後只帶來了德里達的「自毀原則」；神學是一門用哲學的方式證明神存在的學說，神學只思想神，卻不接受神更不能發表神；宗教滿足於人對自然崇拜的要求，在繁複的儀式中建立虛假的信心來猜想神；禪宗通過建立一套虛無的形式來否定生命從而達到泯滅人性的目的，因為人的自由意志在這時被瓦解，人失去了揀選的立場。

我思我不在，我感覺我也不在，思是對於道理，感覺是對於可見之物的。道理可以被證明也可以被偽證；可見之物是會配壞的。這一切都將過去，只有生命是永恆的。不是先有了認識能力才有生命，而是先有了生命才有了認識能力，所以，生命是人的源泉和根基。生命是個奧秘，人類只有站在順服的立場上，以接受啟示的態度才能認識這個奧秘。很顯然，神作為生命，與人類只能建立信靠關係，而不是認識和理解的關係。

信靠意味著順服和接受，神學對神只理解並不接受。但信靠並不指放棄人的意志（如邪靈作用於氣功使人放棄意志），恰恰相反，神給人以自由意志，這是聖靈工作的原則。常常遇到這樣的詰問：神為什麼在伊甸園設立兩棵樹而讓人故意犯罪？持這種詰問的人忘記了人是自自由意志的。



這是人作為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徵。在《舊約》中神有一個最重要的名字叫：強而有力者起誓約束自由（即以羅欣）。還有一個名字叫自己生存者，自有永有者（即耶和華）。這就是說他是初者，是中心和義，他不能違背他自己。《聖經》告訴我們，神是唯一的權柄，但神要得彰顯必須有代表權柄，神最初把權柄交給天使長時，他同時給了天使長自由意志，神並沒有旨意要天使長背叛，神要天使長代表一切的正面事物，代表正義、真理和光。光的另一面是暗，正如積極的另一面是消極一樣，如果順從神就進入積極的一面，如果背叛就進入消極的一面，並不是神沒有阻止背叛的能力，乃是他不能違背他自己，他自己起誓約束自己，正如神與人立約不僅對人有要求，反過來神也同樣約束自己一樣。天使長錯誤代表神的權柄以至成了背叛的靈，背叛的靈進入人的魂使人墮落離棄神，於是所有受造之物一同墮落，進入消極和黑暗。亞當離開神獨立，該隱（亞當的兒子）就犯罪，他說：我的刑罰太重，我必流離飄蕩在這地上。這種境遇幾乎代表了人類走過的全部歷史，人離開了啟示的立場便從恩典中墜落，被拘禁於時間中。亞當和夏娃對知識之果吃了必死的話表示懷疑（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創世紀三章一節）成了哲學的前提，到了末世，哲學的前提和結論一同瓦解了，人自動地離開了中心，這個中心正是我們的故鄉。所以在這個「嚴重的時刻」，里爾克說：「在時間的歲月中永遠沒有我的故鄉。」在這裏宣告了人的終結。

「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希伯來書十一6）這裏的信是一切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對於生命和永恆，人類的思考和猜測都無意義，只會產生無意義生活之痛苦，人類只

能確信。因為眼見之物是從眼所不能見者而來，認識能力的物件是眼見之物，信靠的物件則是生命和權柄。人類的認識能力是人的魂的功能，魂的功能（如悟性）是可用的，但魂的生命（指人向神獨立的生命）必須殺死，只有靈能認識神，魂裏有人的心願，情感和意志，靈裏有良心，直覺和交通。後者是認識神的唯一器官。

以上的表述與神學無關，甚至跟文化的原則無關。人類的文化原則就是巴別塔的原則，人類建造通天塔的方法是「把磚燒透了」，磚是認的造物，石頭是神的造物；人類建造巴別塔的目的是「通天」，「傳揚我們的名」。結果神要下來察看人的作為，並使他們分散在地上，「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神對人悖逆的詛咒和定命，使人失去與神的交通，人類自己也就失去了交通。巴別塔就是變亂。目前，我們的境遇正淪陷在這座變亂之城裏，彼此言語不通。德里達隊失語的策略是解除「言語」對「書寫」的壓迫，卻暴露了一個真相：「人類是自己毀了自己，人進入了消極，徹底喪失了話語權力，言說與物件分離到一個地步：若不再悔改，斷不能從自我回到恩典中，唯有藉著信，才能得回啟示的立場。所以，現在使用任何言說方式都是徒然的、對話、冥思、獨語、自白、聒噪、呼告。唯有祈禱，人這裏一禱，神那邊就以啟示回應。

我想現在我才有可能回到我們的情境：文學。作為一個作家，對人自身最堅決、深刻、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能來自於信仰。對我而言，人文精神就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是我感動的源泉，寫作是依靠感動而不是依靠感覺的，感動裏有真知，感覺卻是沒有原則的，在感覺裏，語言可以成為遊戲，頹廢的情緒可以歌頌，自瀆可以接受。因為感覺的要求與真知無關，它只求新奇和怪異。文學一旦從感動淪陷到感覺裏，人類所有不健康的體驗都隨之湧出並且成為時尚，從而被當作價值接受。作家的寫作從感動下降到感覺，實際上是放棄對真理追求的立場所導致的。

沒有一種文學是沒有立場的，重要的是它站



的是什麼立場。無論是所謂尋根文學，反思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主義或者痞子文學，無一不持有自己的立場，連放棄立場也是其中代表。至於當代中國思想界熱衷的結構遊戲，只是一種活動，它缺乏物件，因為不存在可解之構。在中國文化中從來不存在神聖話語中心可供解構，而禪宗所代表的本來就是一種虛無。唯一可供操作的是意識形態中心話語，但在這裏必須換一個詞：解構變成了反對。事實上解構一詞在中國就是被這麼使用的。現在已經顯明，重新找回言說的立場和能力既不是建立東方文化霸權，也不是接受文化霸權，乃是接受啟示。

在啟示的光裏，我們會看見當今時代作為末世的種種真實的特徵。在末世，人對自己無話可說的時候，寫作將何以存在？作家將依靠什麼繼續從事寫作？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場文化討論可以解決的，它需要作者找回一種真實的甚至是唯一的立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他渴想神又帶著懷疑的立場使他的精神始終處於分離的邊緣；在卡夫卡那裏，人由人蟲變成了地洞中不知名的小動物，卡夫卡試圖在基督教中找到避難所，但他終於沒有足夠的勇氣向人宣讀教義，因為沒有信心；魯迅對付惡的方法是以惡抗惡，但他無法因此擔當正義，為了抵抗黑暗，他覺得他自己也越來越黑暗；普魯斯特找到了一種「追憶」的方式，建立了一個向後看的烏托邦；海明威具有一種失敗後的英雄那種虛假的信心，最後還是自殺；川端康成以美為終極和至善，並不惜附上頹廢的代價，結局也是自殺；博爾赫斯是個有名的烏托邦的製造者，語言烏托邦的煉金術士，智慧迷宮的設計師，這個盲者拒絕看見，他只要聽見就夠了，他能夠聽見詞語與詞語之間建築巴別圖書館時的碰撞聲，並從中找到快樂。他類似一個寄生於蚌殼的珍珠，在烏托邦建築中靠一詞語活著，正如在《阿萊夫》這篇小說中，他終於使自己相信了阿萊夫這個本來毫無意義的詞成了宇宙中心代表的謊言，這需要多大的心智力和來自黑暗的力量呵！就把博爾赫斯視為末世最後的代表作家是有理由的，因為當烏托邦代替文學中的浪漫

主義成為理想之後，再也沒有什麼能代替神了，好像戲演到終場，結局就要顯現。當然，不會自殺的博爾赫斯至少還不敢指證烏托邦的本質即它的不可居住性，所以，他最後相信一個詞，相信由一個又一個的詞建築起來的一個系統，在這個巨大的迷津中充滿了緊張的關係，這在中國文化精神花園裏是見不到的。但我要說的是，博爾赫斯的作為跟德里達一樣，「書寫」就是「聒噪」，它否定一切絕對真理。正如有常說的一句話：上帝無法創造一塊它舉不起來的石頭。這句話只對語言本身有意義，對真理（在《聖經》中真理也可譯作實際）是無效的。

關於瀆神可以產生一個思想系統，關於神也可以產生另一個思想系統，它們都是道理。我們當如何判定哪一個是真理呢？誰的話才是有效的呢？誰來下這個斷案呢？我的回答是：良心。良心的聲音是最權威的聲音，良心在人的靈而不在人的魂裏，靈是與神接觸的唯一途徑。

作為一個基督徒作家，我呼籲一個良心的立場，一種良知的寫作，無論在中國乃至世界，只有這種寫作在末世是有意義的。我們必須正視人的罪惡及其在文化中的後果。如果缺乏神聖背景，人文精神的實踐是不負道德責任的，在西方有海德格爾的附逆，在中國有周作人的妥協；如果不從良心的立場出發，尼采的人文精神就會實踐為法西斯主義，讓良心告訴我們，並讓我們看見，尼采的發瘋和那個發了瘋的時代的關係，在奧斯威辛死去的是人性，不是神；當人性殺害猶太人時，人性就殺害了自己。

語言是一把刀，這把刀在誰手裏誰就可以殺人。在這裏我要引用一個在集中營的孩子莫泰利的一首詩，他說：



從明天開始，我將悲傷。
從明天開始。
今天我將快樂。
悲傷有什麼用？
告訴我吧。
就因為開始吹起了這些邪惡的風？
我為什麼要為明天悲痛，在今天？
明天也許還這麼好，
這麼陽光明媚。
明天太陽也許會再一次為我們照耀。
我們再也不用悲傷。
從明天開始。不是今天。不是。
今天我將愉快。
而每一天，
無論它多麼痛苦，
我都會說：從明天開始，
我將悲傷，
不是今天。

這個孩子的寫作沒有語言，只有心。這是一個孩子的故事。對於這個問題，除了良心之外，沒有人能回答。我想繼續引用集中營另一個叫瑪莎的女孩死前所寫的一首詩：

這些天我一定要節省。
我沒有錢可節省；
我一定要節省健康和力量，
足夠支持我很長時間。
我一定要節省我的神經和我的思想和
我的心靈和我的精神的火。
我一定要節省流下的淚水。
我需要它們很長、很長的時間。
我一定要節省忍耐，在這些風暴肆虐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力我有那麼多需要的，

情感的溫暖和一顆善良的心。
這些東西我都缺少。
這些我一定要節省。
這一切，上帝的禮物，我希望保存。
我將多麼悲痛倘若我很快就失去了它們。

我引這兩首詩作結的意義在於，讓這兩個兒童的寫作喚起我們已經麻木的心，看看是否還能獲得寫作的力量；並且良心、正義、愛和感動，連孩子都知道的這一切，上帝的禮物，孩子希望保存的，在我們手中還有多少？這些我們本來並不缺，作為賞賜神早已給了我們，是我們把它拋棄了，是我們沒有保存，是我們。我們這些不肖之子。

1994年10月17日龍岩

